社会文化

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高王凌

[摘要] 最近几年时间，人口问题成为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争论之一。问题几乎涉及到改革开放 (特别是近十年) 有关研究的所有方面，争论的双方不但有国内，也有国外的不少知名学者。作者并不属于其中哪一方 (也许可以算作第三方)，仅就清代中国人口机制、人口增长率以及人口作用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清代人口　人口机制　增长率　人口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04) - 01- 0015- 06

Debate over Population in the Shadow of Malthus Theory

In recent years, popul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controversial subjects, in which many famous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participate. The author believes he does not belong to any side and puts forward some innovative viewpoints on Chinese population mechanism,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Qing Chi2 na.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但拓宽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使其踏入更为细致深入的层面[1]，而且就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见解，和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学术争论。这对沉寂的学界来说，大约也是一个 / 异数0。本文无意对此作出全面评价，只打算就其中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5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6°一书的争论，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中国人口机制

李中清和王丰在 5人类的四分之一6 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就是关于中国人的人口行为了：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中国已婚夫妇自结婚至开始生育的间隔时间比较长，结束生育的时间比较早；在集体家庭的严密监视之下，中国夫妇能够控制 / 性的激情0；当他们想要孩子时，他们能够加快其过程，否则他们就节制和等待；他们又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其计划人口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婴儿存活。” 这些论点 (特别是最后一点) 发表之后，自然引致了学界同仁的激烈争论。

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 积极制衡0(即战争、瘟疫和饥

[收稿日期] 2003- 5- 20
[作者简介] 高王凌 (195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

荒) 控制的, 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 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 / 悲观0 论点, 现在看来, 岂不都成了一个 / 神话0[¼]?

由此, 一个新的 / 神话0 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 不是在 20 世纪, 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 试问: 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 (和它的普及), 一些地区 (特别是江浙地区) 的人口, 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 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½]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 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 / 避孕0 的。在这里, 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 / 取证0, 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 在 5人类的四分之一6 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¾] 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 例如, 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 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 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 等等。[¿] 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 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 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 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 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 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二种 (包括针灸、推拿, 食物避孕, 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 。[À] 有评论指出, 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 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 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Á]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 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 自清代以来, 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 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 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 / 强力避孕药0 了 (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 是否会造成 / 不孕0 的效果, 于 / 不自觉0 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 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 / 断产0 和 / 疏胎绝产0 方剂 (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 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 / 防免作胎0 之法了。而且, 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 尚处于 / 尝试阶段0, 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Â] 在笔者看来, 就不免偏重于 / 流产0 (堕胎) 等 / 杀生性0 的技术手段, 对于如何 / 避孕0 则重视不够。而这, 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 在中国历史上, / 避孕0 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 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 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 从此就不能怀孕 (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 也就 / 歪打正着0, 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 将一种药物 / 斑蝥0 (/ 蝥0) 置于子宫颈口 (似用一纸捻送入), 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 / 从良0 之后, 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 还有土制 / 避孕套0, 压穴法 (如指压会阴以 / 还精补脑0)、体外射精法, , 等等。[lv] 我相信, 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 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 (我想再强调一句, 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 / 避孕0 办法, 而不是 / 堕胎0、/ 溺婴0 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 而更多地须倚赖 / 口述历史0 资料。

20 年前, 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 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 曾经受到同行的 / 讥笑0。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 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 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 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 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 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 那么, 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 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 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 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 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 / 生育控制的普及0 之间, 必然存在一种 / 密切的关系0[lw]?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 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 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 (或类型), 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 其第一项, 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 它的表现之一, 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长速度 / 自然0 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地区, 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 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 乃是一个规律。[k] 而这, 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 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实际

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0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y]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零增长0的即很值得研究)。[z]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0。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5、6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166当作20世纪40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大约在61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15个孩子，相差不多[}]；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5、6个孩子。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生三计之0(即一变为五矣)，/子各娶妇即有八人0，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0[m]，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0，已经达到了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j[nm]；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长0了[wm]?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xm]?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科学论证0，而不过是/抛砖引玉0罢了。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修复0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科学分析0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一起，将会产生/不伦不类0的结果。[ym]

这一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长0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15j，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zm]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0，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j，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19j而已。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m]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16

亿[m]；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 1688 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 116 亿[m]，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 /低增长0 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一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 /以丁折口0，就成为一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笔者曾经使用 /回测0 (或曰 /倒推0) 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m]

为什么不使用 /预测0 而采用 /回测0？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一些。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一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一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一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前边所说的 /不足 7j 0，就是不同的说法之一。1983 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一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 (从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数字) 的人口年增长率为 13j 左右。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 15j 或更高一些 (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间)。于是，以此 /回测0 计算出 1700 年中国大约有 1 亿人左右。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历史上有没有过 /先例0？实际上，汉代从公元 57 年至 157 年约一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 919j ；宋代从公元 976 年至 1110 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 1414j (同期人口增长率为 1012j)。可见并没有什么希奇。[n]

我为什么不同意说清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或把明清两朝 /等同看待0？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即怎样看待明清两代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经过反复平衡、考虑，总是认为明代经济发展远远不如清代，因此才有这个认识。

这样看来，关于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之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不能轻易定论。

三、关于人口作用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 /人口过剩0 和 /人口危机0 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中国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 /过剩) 缓解) 重新过剩0；人口过剩的难题 (始终) 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M] 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 /人口过剩0 (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W] 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历史上曾否存在 /人口压力0 都不无可疑了。[N] 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0 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 /人口压力0 与 /人口危机0 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 /障碍0 或所谓 /阻碍0 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 /力0 (或曰 /感受力0) 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 (或不发展) 程度的指标，好像 (经济发展) 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N]，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 /主) 客观0 或 /认识论0 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 (或曰 /当事人0) 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Z] 清人自 18 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 (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 /不合逻辑0 或 /有悖史实0，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 (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h] 其内容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工业的相应发展，等等 (因此我也坚持使用 /经济发展0 的概念，而不随意以 /经济增长0

取而代之)。[h] 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 /走投无路0 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 /升级换代0。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h] 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 /人口压力0 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0 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 /没有发展的增长0[n]？而在那一类所谓 /过密化0 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 600 年，直到今天 (乃至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 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 /一无是处0。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o]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 /罪魁祸首0，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 (或以为用它就能分析解释一切)，并认为其作用一直就是 /负面0 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 /起步0 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 /恢复时期0 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0，后 /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0，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 /规模经济0 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v]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 /非充分生产0 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养育了十几亿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 (及其他农副产品) 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 /始料不及0 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五常在 5佃农理论6 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w] 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 /不是0 都推在 /人口0 上？或把那一切都称作 /不是0 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 整体性贫困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x]。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人也数次得到学界同仁的善意批评。如一次在争论中，有同事说：如果把清史写得这么好，还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对此不能不给予正面回答。

问题在这里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关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评者和我也许都不同意 /盛世0 派一味夸饰的作法；可能也不赞成十八世纪的政治史只是一个 /反贪污史0 的观点。为此，我将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 (我们对清史) 写得 /还不够好0。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 /革命0 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即便我们把清史写得再好 (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一些 /先进国家0 的 (工业) 革命理解得太 /轻而易举0，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即使

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0 国家了。而中国在二十世纪面临的现代国家的/三层重建0 (以及/反帝反封建0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0 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一以马氏的/马首是瞻0，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一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一个/反向提问0：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0 才是够味，反之则失去了其意义和现代价值似的。所以，在有关方面，我想，我们还有许多的基本建设要作。

早年笔者曾就人口问题作过一点研究，随后传闻/淡出江湖0，也就不免于/孤陋寡闻0和/落伍时代0 之讥。兹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

¹ 当然，在有关研究中还存在不少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参见王国斌对家谱资料分析的批评，5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29。

º 李中清、王丰：5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6，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以下简称5人类的四分之一6)；按：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 5人类的四分之一6，页54、81、156、10。

¼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0，5中国学术6 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页71。

½ /堕胎、避孕与绝育0，页73。

¾ 5人类的四分之一6，页131。

¿ 5人类的四分之一6，页137。

À /堕胎、避孕与绝育0。

Á 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0，5中国学术6 2000年第3期。

Â /堕胎、避孕与绝育0，页89)90、84)85。

lv 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lw /堕胎、避孕与绝育0，页73。

lx 参见高王凌：5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6，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

ly 参见高王凌：5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6，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页96。

lz 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0，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0，引文见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248。

l{ 5人类的四分之一6，页123。

l| 曹树基：5中国人口史6 第五卷5清时期6，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页877。

l} 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0(未刊稿)。

l~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0，5历史研究6 2002：1。

mn 洪亮吉：5卷施阁文甲集6 卷一5意言6；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0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0 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5中国人口思想史稿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页204、237。

mn 5中国人口史6 第五卷5清时期6，页856。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了人口增长了一倍的现象。

mn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0。

mn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0。

mn 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mn 5人类的四分之一6，页165。

mn 5中国人口史6 第五卷5清时期6，页835、836。

mn 5人类的四分之一6，页216。

mn 5中国人口史6 第五卷5清时期6，页832。

mn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0(5中国社会科学6 1982B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0(5清史研究通讯6 1983B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0(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5未定稿6 1982B32)等。

nn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0(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5人口理论与实践6 1984B2)；/清

(下转第57页)

⑰董沛《南屏赘语·汪世宰等呈词判》。
⑱王梦韶《判语录存》,道光癸巳年刊本 第三卷 “争产事”。
⑲樊增祥《樊山判牍·批张李氏母子呈词》。
⑳《诗经》有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44 页。陆机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细小。或在草莱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其子。” 见该书第 745 页。此即说土蜂蜾蠃将螟蛉之子背走,置于树洞中,对着螟蛉子不停地喊“像我,像我。”七天后,螟蛉子就变成蜾蠃了。
㉑《国语·晋语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56 页。
㉒《春秋左传·成公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17 页。
㉓《春秋左传·僖公十年》第 362－363 页。
㉔《春秋公羊传》对此解释说:“莒称人者,莒公子,鄫外孙……言灭者,以异姓为后,莒人当坐灭也……非兵灭。”何休注曰:“时莒女嫁为鄫后夫人,夫人无男有女,还嫁之于莒,有外孙。鄫子爱后夫人而无子欲立其外孙”。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0、422 页。
㉕《春秋谷梁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8 页。
㉖《孟子·离娄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6 页。
㉗《礼记正义·曲礼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5 页。
㉘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 409 页。
㉙樊增祥《樊山判牍·批张李氏母子呈词》。
㉚樊增祥《樊山判牍·批张来祥呈词》。
㉛邱煌《府判录存》卷五:“审得韩城县武生王茂清控告捐贡王国典一案”,道光年间刻本。
㉜徐士林在其《守皖谳词》和《巡漳谳词》中,对于异姓乱宗情况一律认为其非法,王梦韶也是一样,而樊增祥在其《樊山判牍》中,对于一些异姓乱宗的立嗣情况并不一概否定,而是承认其有效性。
㉝见法政学社编纂《中国民事习惯大全》(1927 年),台北广益书局 1967 年影印本。该书是清末民初司法部的调查材料,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该书体现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其中在第三编 “亲属”这一部分中,有全国各地的关于立嗣继承问题这一风俗的记录,那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允许异姓继嗣的风俗。
㉞董沛《南屏赘语·汪世宰呈词判》。

(上接第 20 页)
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㉛《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 870。
㉜《人类的四分之一》,页 47。
㉝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1;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页 177。
㉞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㉟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多处。
㊱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
㊲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 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90:4;《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更早关于“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页 43、34。
㊳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㊵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页 19。
㊶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 9 章第 3 节。
㊷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
㊸《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页 848。